

强,东亚地区的中小国家更加倾向于对中美日采取平衡政策,东亚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凸显。

第四,秩序竞争加剧。东亚合作历经十载,其初期阶段容易达到的诸项目标业已实现,下一步预期实现的更高目标则势必触动地区秩序的深层结构。这些深层次结构的调整包含着要解决如下问题:东亚自由贸易区何时建立?东亚合作是以“10+3”为核心,还是将走向“10+3+3”乃至“10+3+3+N(美俄)”体制?东亚能否走向区域货币合作?东亚能否真正走向区域安全合作?东盟是否有能力、有意愿把东亚各国带入一个“区域共同体”?东亚合作由初期阶段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实质是本地区各国将建立何种地区秩序的问题。美国对东亚走向摆脱其控制的趋势表现出了强烈的危机感,并开始做出了拒绝反应,欲以其他地区合作方案抵消东亚一体化进程。美国对东亚影响的强化和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引发了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日本在安倍晋三首相时期开展了异常活跃的“价值观外交”,即大力强化日美同盟、倡导建立“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欲在欧亚大陆构筑“自由与繁荣之弧”,拉拢印度建立一个“大亚洲”。福田康夫出任首相以来,调整了安倍晋三的政策,不再提“价值观外交”。东盟各国在依赖美国和区域合作这两种安全战略思想上也存在分歧。在韩国,近年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精英层和舆论中有所抬头。

在宏观思路,东亚合作始终面临如下选择:应首先循序渐进地推动功能性合作,还是应优先构筑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机制?在具体思路,东亚合作面临四条道路:(1)先经济,后政治与安全,最后

是文化;(2)政治与安全先行,然后是其他领域;(3)经济与政治、安全并行;(4)先文化,然后才是其他领域。其中,最具可行性的一体化顺序似乎应当是,第一阶段:先经济、后政治与安全,但个别国家和地区则应是政治与安全先行,如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第二阶段:经济与政治、安全并行;第三阶段:文化认同成为主要内容。

21世纪初期的中日关系能否实现双赢发展,关键在于如何设计和对待未来的东亚秩序。反过来,东亚地区能否实现共同发展的最佳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日关系能否进入更加成熟的新阶段。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超强的综合国力和对外影响力,其在东亚地区的重要影响是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因此,缓解美国的疑虑,排除其干扰,是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条件。为此,东亚各国应就如下几点达成共识:首先,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是基于经济合理性之上的合作;其次,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是环太平洋合作之下的开放的次区域合作,两者并不相互矛盾,而是互补和互促的;最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下一阶段以及东亚区域安全合作阶段将允许美俄等东亚外围国家的更多参与。

由于东亚各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实力、文化传统都具有很大差异,走向“东亚共同体”的进程必将是一个渐进、漫长的过程,但东亚各国都认为,推动区域合作是其在21世纪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因此,东亚合作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

东亚安全共同体的现实基础与未来出路

孙学峰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2001年10月,东亚展望小组向“东盟+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提交报告,提出要建立东亚

共同体,并将此作为东亚地区合作的最终目标。该报告强调,东亚安全是东亚各国关注的问题。东亚各国的共同目标是把东亚建成一个持久稳定的和平区域。对此,持悲观态度的人士认为,东亚尚不具备建构完美的“区域共同体”的土壤。东亚各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巨大差别对建立区域共同体构成了严重障碍,而持乐观态度的人士则认为,欧洲共同体建设取得了成功,同样经历过战争的东亚国家,也应该具有这样的远见、勇气和智慧,把东亚共同体作为长期致力的目标。

不难发现,无论悲观派学者还是乐观派学者都以欧洲安全共同体建设的经验来推测东亚的未来,因此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按照悲观派的逻辑,较小的国家差异将有助于形成安全共同体,但二战前这些西欧国家为什么没有建成安全共同体?再如,按照乐观派的推论,东亚将会按照西欧成功的经验走向安全共同体,但这种认识严重忽视了当今的东亚与冷战初期西欧的重大差别,也不符合在过去几年中东亚安全共同体取得进展的内在逻辑。

有鉴于此,本文将重点论述三个观点:第一,近几年东亚地区主要安全问题的有效缓和为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奠定了现实基础。第二,中国的自我克制政策是东亚安全问题有效缓和的基本动力。第三,巩固和深化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有赖于中国的自我克制政策得到相关国家的善意回应和制度保障。

一 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基础

从学术意义上讲,东亚安全共同体属于多元型安全共同体。这种安全共同体是指主权国家组成的跨国区域集团,其区域内的人们对“和平变革”抱有可靠预期的共同体。多元型安全共同体具有两个核心特征,即共同体内没有战争以及没有针对其他成员国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战争准备。从政策层面上讲,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的是要消除地区内战争的威胁、预防东亚各国之间的冲突、促进东亚共同体的认同,将东亚建成持久、稳定的和平区域。

无论是按照学术标准还是按照政策设计,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设都要经历三个逐步深化的阶段,

即区域内国家避免通过战争的方式解决分歧,消除军备竞赛、形成东亚地区认同并确保和平的预期持续稳定。也就是说,建设东亚安全共同体的首要步骤是:区域内国家应采取和平手段解决安全矛盾。而近几年的实践表明,东亚地区可能引发战争的主要安全问题都通过和平手段实现了有效缓解。

首先,南海问题得到了有效缓和。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该宣言强调,各方希望为和平与永久解决有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议创造有利条件。相关各方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其次,朝核问题逐步趋于平静。2005年9月,在六方会谈第四轮会议的《共同声明》中,美国政府承诺不攻击朝鲜和保障朝鲜安全的责任。2007年2月,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三次会议在北京达成了《共同文件》规定在30天的准备阶段和60天的起步阶段内,美国取消对朝鲜的金融制裁,而朝鲜应该将宁边核设施“去功能化”,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并报告其所有的核计划。2008年6月26日,六方会谈中方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发表声明称,朝方于当日向六方会谈主席国提交核申报清单,美方将于同日履行其将朝从“支持恐怖主义”名单中除名和终止对朝适用《敌国贸易法》的承诺。

最后,中日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2008年6月,两国一致同意在实现划界前的过渡期间,在不损害双方法律立场的情况下进行合作。中国企业欢迎日本法人按照中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有关法律,参加对春晓现有油气田的开发。中日两国政府对此予以确认,并努力就必要的换文达成一致,尽早缔结相关条约。

概括而言,冷战结束后困扰东亚地区的主要安全问题,即南海问题、朝核问题和东海问题都没有通过战争手段加以解决,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得到了有效缓解,东亚地区的和平局面继续得以维持。从目前的发展趋势观察,在三五年内,这些安全问题通过战争解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说明东亚安全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已经初步具备。

二 中国的作用

近几年东亚主要安全问题没有引发战争而是通过和平方式得到了缓解,有赖于多方的共同努力,但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则是中国一直坚持自我克制、和平处理安全矛盾的基本政策。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坚持认为,有关领土的争议应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来和平解决,同时积极推动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最终达成。在朝核问题上,中国始终主张,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地区的长久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的根本利益。为此,中国承担了繁重的外交斡旋任务,创造性地推动六方会谈不断打破障碍,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做出了突出贡献。美国总统布什也强调,2007年2月的六方会谈《共同声明》与1994年《框架协议》的最大不同是“中国因素”的加入。在中日东海问题上,中国意识到如不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任凭东海问题升温,势必干扰中日关系大局。而在不涉及主权利益问题的情况下做出过渡性安排,可以避免这一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障碍。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东海的和平与稳定,也有助于亚洲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中国充满善意的政策思路为两国防止东海分歧引发冲突发挥了关键作用。

上述分析表明,东亚地区安全矛盾未通过战争手段解决,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政策思路和具体行动。换言之,中国极力避免相关各方采取战争手段处理地区安全问题的政策实践,为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构筑了最为基本的现实基础。

三 未来出路

首先,未来5~10年内,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难以复制西欧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国家面临着共同的安全挑战,而这些挑战为启动安全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动力,创造了条件。一是共同衰弱促进了它们的联合自强。二战导致了西欧国家实力地位明显下降,因而无法继续主导世界政治。欧洲国家意识到它们彼此之间的冲突已经缺乏全局意义,只有摒弃前嫌、携手合作才能平衡外部力量,才

能屹立于国际社会。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N. Waltz)曾就此论述道:“只要欧洲国家还是世界大国,欧洲国家之间的联合就只能是梦想,而不可能实现。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出现,为更大范围和更有效的西欧国家之间的合作创造了一种环境。”西欧国家的决策者们也同意这一思路。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就曾指出,“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在联合起来的欧洲建立一个第三种力量。如果美苏之间潜在的分歧发展成为严重的紧张局势,为了维护和平,它可以在天平上投入自己的砝码”。二是苏联威胁促使其寻求美国的安全保护。由于实力地位衰弱又面临苏联威胁,二战后,西欧国家与美国组建了北约,并实际上把自己的防务责任交给了超级大国美国。而美国的安全保护大大降低了西欧国家之间的疑虑和担心,为西欧安全共同体的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前,东亚国家面临着与二战后西欧迥然不同的客观环境。一是大部分国家的实力(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正经历着不同类型的上升过程。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实力迅猛发展,日本则致力于提高政治实力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东盟国家则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地区联合取得了新的进展。实力地位的上升促使这些国家在推动合作的进程中,更加关注主导权的归属,更加关注合作收益的分配,更容易陷入二战前西欧大国合作面临的问题。二是东亚区域内一些国家和地区依靠美国提供安全保护,一些国家则依靠自身力量维护安全,与拥有共同安全保护的西欧国家迥然不同,这也加剧了东亚国家在安全合作过程中的猜忌和怀疑,不利于防止战争和建立信任。

在未来5~10年内,东亚国家整体实力上升和缺乏统一的安全保护这两个趋势将得以延续。因此,西欧当年的经验很难应用于今日的东亚。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未来有赖于区域内国家间如何在没有共同安全保障的环境下防止战争、增进合作。这既是东亚国家必须面对的政策问题,也是东亚国家学者们必须回答的理论问题。

其次,区域内影响力较大的国家奉行自我克制的和平政策将有助于防止区域内安全矛盾激化,为面临诸多困难的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奠定基础。也就是说,东亚区域内有安全影响力的国家可能要在

其他国家未必表现出足够合作意愿的情况下,率先采取合作举动,释放善意,为防止战争和增进信任提供初始动力。中国是安全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区域内国家,因此中国能否采取自我克制的和平政策来应对地区安全问题将直接影响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的基础。过去几年的实践经验也恰好说明了中国政策取向的关键作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自我克制政策并未完全得到相应的善意战略回应。比如,自2004年以来,越南在南沙采取了一系列非善意的行动,有违《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对南海地区的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又如,在台海局势明显缓和后,美国官员公开敦促中国政府,声称中国政府不应压缩台湾当局的“国际空间”,日本也力图牵制海峡两岸交流。再如,2008年6月,中日双方就东海问题达成

原则协议后不久,日方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反对,放任部分日本议员前往中国钓鱼岛上空进行所谓“空中视察”。

这些并非善意的回应,不但不利于东亚国家之间建立安全信任、推动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深化发展,而且容易激化矛盾、破坏东亚的和平局面、损害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的基础。国家推动安全共同体建设的目标是谋求良好的安全环境,因此,如果相应的政策正在损害本国的安全,则理性的决策者需要重新考虑本国的政策趋向。简言之,中国的自我克制政策只是为东亚地区安全共同体的建设创造了初始条件、奠定了最为基本的现实基础,而要巩固、深化地区安全共同体的建设、逐步构建东亚地区认同,还需要区域内其他国家对中国自我克制政策做出善意的战略回应并探索相应的制度保障。

威胁与安全共同体的形成: 对沃尔特理论的几点修正

李开盛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博士)

要想弄清楚安全共同体将在何种条件下形成,就必须界定好“安全共同体”的概念(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是“安全机制”与“联盟”)。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对安全共同体的界定被广为引用:安全共同体是一群联合起来的人,他们确信不会彼此交战,而是用其他方式解决争端。多伊奇把共同体分为合并型(amalgamated)和多元型(pluralistic)两类。在他看来,合并型共同体实际上就是民族国家,因此我们常讲的安全共同体实际上相当于他所说的多元型共同体。多伊奇认为形成多元型共同体有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决策者的价值观相互包容;准备参与一体化的各单位的决策者们可以预知彼此的行为;相互响应——具备密切合作、及时处理紧急问题的能力。我们必须把安全共同体与安全机制区分开来。正如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所强调的,安全共同体意味着发展了一种长期和平交往的习惯;而安全机制通常是指一种行为体的利益既不完全协调又不根本对立的状态,甚至可以在相互敌对的关系中产生。而且,安全机制并不必然意味着参与者对整体联系、合作、一体化或相互依存感兴趣并参与其中,而这些恰恰是安全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对两者进行区分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有的学者正是将安全共同体混同于安全机制,从而对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前景做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当然,两者并不是毫无关联,安全共同体应该包括某种机制性安排,否则无法像多伊奇所要求的那样相互响应、密切合作。但如果一对国家关系仅仅处在通过机制协调矛盾甚至是敌对利益的阶段,而没有进一步发展成一种基于整体关系的长期和平状态,那么我们就不能说安全共同体已经形成。

Abstracts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Japanese Factor

Feng Zhaokui (6)

During the thirty year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Japanese factor has largely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China promoting a peaceful peripheral relationship for its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s foreig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Japanese factor has long been on top of the list of all foreign partners. When China learns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foreign economic development, Japanese is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during the process of China seeking for foreign aid, Japan provides the most among the developed donors. In the future, as China continues to deepen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carry out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apanese factor will still be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providing experiences and a win-win cooperation.

Review of Seminar on "East Asian Community: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Regional Identity"

The seminar on "East Asian Community: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Regional Identity", co-sponsored by the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as held at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n 13 June, 2008. Many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Tsinghua Universit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angtan Un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ureau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ttended the seminar upon invitation. Wang Yizhou, the vice director-general of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and Jin Xide, the vice director-general of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haired the conference. The seminar was carried on in the unified form of subjective reports and free discussion. All participants held a thorough and deep discussion on East Asian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conomy and culture. See the following series.

East Asian Cooperation Enters the "Deep Water"

Jin Xide (16)

East Asian Security Community: Foundations and Prospects

Sun Xuefeng (18)